

坚决扛起央企责任担当 全力以赴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中国石化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度，配强人员力量，创新方式方法，助力脱贫攻坚取得积极成效。目前，集团层面帮扶的8个对口支援和定点扶贫县中，7个县实现了脱贫摘帽；所属67家企业承担的709个村的帮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至2019年，中国石化扶贫工作连续3年在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中被评为“好”，扶贫案例被国务院扶贫办、人民日报社评为脱贫攻坚推荐案例，扶贫工作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提高政治站位、扛起央企担当，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助力脱贫攻坚

中国石化党组充分认清脱贫攻坚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坚决扛起责任担当，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强化思想认识，站位再提升。中国石化党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要求必须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来理解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在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做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今年以来，党组3次召开扶贫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了新冠疫情下的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中国石化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走在央企前列，用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央企责任担当。

强化组织保障，责任再压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中国石化成立了由党组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对口支援及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总部领导小组作部署，扶贫办保落实，直属单位听号令的基础组织设置，进一步规范扶贫工作管理，明确职责，压实责任。中国石化党组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贫困地区的牵挂之情，将“一把手”带头下基层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集团主要领导先后赴甘肃东乡县，新疆岳普湖县，安徽颍上、岳西县，湖南凤凰、泸溪县实地调研扶贫工作，在央企中率先完成全部定点扶贫县的调研走访。其他党组成员和总部部门下基层调研扶贫工作46次，带动效果明显。

强化使命担当，投入再加强。自1988年开始承担扶贫任务以来，中国石化已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超24亿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2016至2019年投入资金年均增幅10.4%。除“财力”保障外，中国石化还加强“人力”保障，向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以定点支援、“博士服务团”等形式选派挂职干部工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石化每年派出扶贫工作专（兼）职人员约1900人，成为扶贫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得到地方干部群众普遍好评。今年中国石化积极承担引进帮扶资金的责任，全面动员中国石化合作伙伴、合资企业等100余家社

会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中，20天引进帮扶资金突破3000万元，预计全年引进帮扶资金突破4000万元。

聚焦深度贫困、持续精准发力，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助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中国石化党组把帮助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想方设法断穷根，千方百计谋新路，使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助力贫困东乡变梦乡。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东乡。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临夏东乡县最贫困、自然条件最恶劣的高山乡布楞沟村，殷切嘱托：“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让贫困群众尽早脱贫过上小康生活。”中国石化党组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历任领导班子多次到东乡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派出4批6名挂职干部，成立东乡县帮扶工作组，推进以布楞沟流域为重点的精准帮扶，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5亿元，实施扶贫项目74个，帮助2815户、15523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布楞沟流域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投入资金5000万元完成人饮工程，引来了干净健康的幸福水，改变了车拉、驴驮、人背的吃水历史；投入资金1亿元，建成70公里通村道路，昔日“黄土路”变成“惠民路”；扶持发展养殖业，修建牛羊暖棚圈舍2665间；入股布楞沟村养鸡合作社，树立农民养殖信心；扶持开发民宿项目，推进实施“美丽乡村·中国石化东乡民俗”项目。

开展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国石化党组将高质量的教育扶贫作为提升贫困群众造血能力的重要抓手，通过设立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求学、培训贫困地区教师、援建学校及配套设施、捐赠文教用品等，帮助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年对6个扶贫县制定了每个县基层干部2000人、技术人员2000人的“双两千”培训计划。

做好就业扶贫，稳岗保民生。连续3年在东乡等地召开中国石化专场招聘会，组织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和新疆等地企业，提供中国石化近千个岗位供当地大中专毕业生选择。为落实中央“抗疫稳岗扩就业”工作要求，今年还特别追加3500人高校毕业生引进专项计划，重点聚焦中国石化定点扶贫地区。向定点扶贫县提供社会成熟人才岗位1402个，目前已录用325人，解决贫困群众就业难问题，推动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组织医疗扶贫，解决因病致贫问题。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健康扶贫工作。中国石化连续16年开展“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公益项目，累计捐赠善款超过18亿元，为超过46万名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和希望，并捐建了21所健康快车眼科中心。与基金会合作，在甘肃、新疆等地区推广远程医疗项目，目前已免费救治贫困患者586人，培训医护人员近6000人次。

创新扶贫模式、培育内生动力，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务实措施巩固脱贫成果

中国石化党组立足脱贫谋长远、脱贫可持续，形成了“三化促三链”的扶贫新模式，确保贫困群众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

突出产业规模化，打通生产链。发展产业、培育产品是实施产业扶贫的根本。中国石化依据扶贫县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加工、文化、旅游等产业，培育优质扶贫产品。在甘肃省东乡县，以将藜麦打造成东乡支柱性产业为己任，2019年种植藜麦4000余亩，2020年扩大种植到10000亩，惠及2149户群众。在湖南省凤凰县拉毫村，中国石化帮助居民建设“百美村宿”特色民宿，带来新的致富生机；在泸溪县，建设猕猴桃基地灌溉系统和农产品贮藏气调库，解决农业种植“靠天吃饭”的问题。在安徽省颍上县，帮助村民实施水生蔬菜和双孢菇种植，脱贫效果显著；在岳西县，以废弃桑枝为原料发展桑枝木耳、生物质燃料等循环经济，带动500余户群众脱贫。在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扶持地方建设高寒生态牛羊养殖基地，壮大优势主导产业。

突出销售立体化，畅通供应链。产业扶贫的关键在于消费扶贫，消费扶贫的根本是解决渠道问题。中国石化充分发挥立体化销售渠道优势，在解决扶贫产品销售难题同时，客户也享受到了优质产品。拓展线上电商渠道，开通易捷商城、石化团购网等7个扶贫产品线上销售平台，融合直播、电商、订购、零售等渠道，做大消费扶贫规模。用好线下自有渠道，全面释放产业链宽、长的优势，做强内购转帮销，将新疆、西藏、甘肃、青海等832个贫困县的特色产品引入2.7万家易捷便利店。开辟社会渠道，积极与地方政府、爱心企业合作，通过组织扶贫产品展销推介会等方式打通销售渠道。

突出产品品牌化，提升价值链。打造品牌是提高扶贫产品市场辨识度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中国石化积极输出公司管理和品牌，帮助改善农产品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生产水平，并对农产品进行品牌包装，印上中国石化公益品牌标识、易捷LOGO等，助推扶贫产品走上品牌化的道路，被评为企地产业扶贫合作典范。

中国石化党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扎实有效的行动，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石化力量。



弘扬好学之风

□ 王 杰

读书历来都是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学问多寡也是衡量人品道德的重要标准。从古至今，刻苦学习的不乏其人，细细数来，凡是有所成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爱读书。他们孜孜不倦，刻苦学习，不断丰富、提高、涵养和完善自己。

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都是学而知之，学然后知不足。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一遇到不懂的事情，就会主动向别人请教。一次，孔子到鲁国国君的祖庙参加祭祖典礼，他不时向旁人询问，差不多每件事都问到了。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不懂礼仪，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到这些议论后说：“对于不懂的事，问个明白，这正是我求取知识的表现啊。”

学习不仅能增长学识，更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强大动力。古代很多官员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后，并没有放弃学习，几乎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下朝回家后，大都在读书学习、吟诗作画。我们所熟知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

家无不是如此，例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苏轼、范仲淹，清代的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等，既是垂范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又是名留青史的杰出文学家。

古人将勤学善学的精神概括为：“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无论是少年求学，考取功名以期建功立业；还是中年学思并重，积淀人生的厚度；抑或是垂垂老矣依旧不肯放下书本，一个好学之人会将学习融入自己的一生。由于从古至今人们对学习的推崇，使得我们的历史史册记载了许许多多勤奋好学的故事。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后有一个花园，绿植清新悦目，花朵争奇斗艳，即便如此，他仍能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以至于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过一次。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得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坚持学习需要付出艰辛，一时做到容易，长期坚持却难，终身不辍更难。因此，只有坚持不懈、积少成多，才能有所收获。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中成长成熟的，没有生而知之者，都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坚持学有所思，把知识变为智慧。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我们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至千里、集细流成江海。

我们现在提倡学习型社会，应该把学习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不但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向实践学习，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只有不断学习，才不会被时代抛弃。我们要不断提高完善自己，始终把读书学习与加强道德修养紧密联系起来，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态度，坚持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党史上的为什么（7）

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种错误还没来得及进行思想认识上的彻底清理，因而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党内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他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认识不够。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就明确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说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此外，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一些人身上仍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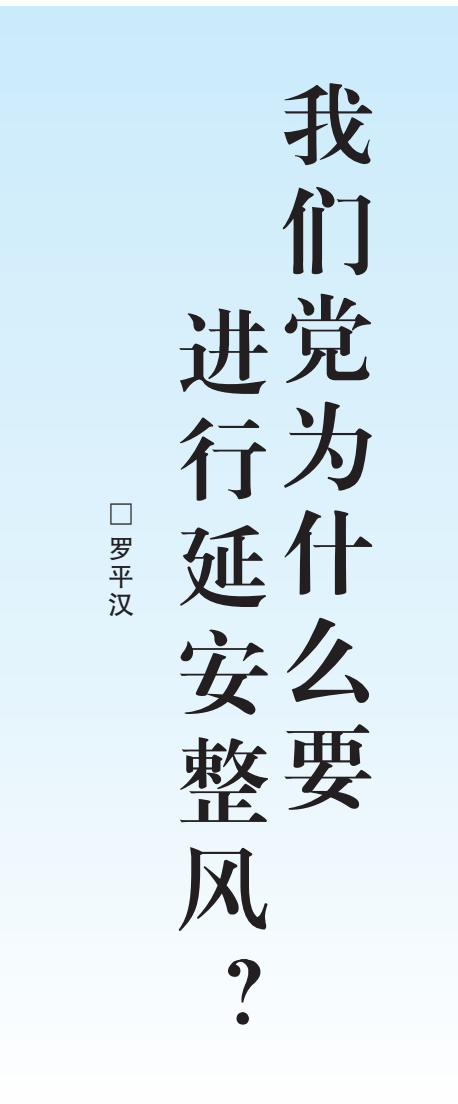
全面抗战爆发之时，全国党员约4万人左右，偌大一个华北地区，尽管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只有5000余名党员。随着大片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影响的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和党员数量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大量的上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随后，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到1939年，仅冀中全区党员就发展到9万多人，全国党员发展到50万人。到1940年7月，更是发展到80万人。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大都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身上还存在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如何整顿党的作风，把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的大环境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内教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建设一个大学，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他号召各级干部发挥“挤”与“钻”的精神，想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把理论问题搞懂。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3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并每月开会讨论二次。同时决定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

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满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抗战爆发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一时唬倒不少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根本行不通。王明那一套主张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实际工作中也没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党内政治上的影响虽已是风光不再，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仍然是党内著名理论家。王明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说会写，发表的一些文章还颇有理论色彩，在延安的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这样的人。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0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



□ 罗平汉

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在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即《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还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明这些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结果理论不能与实际联系起来，他们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党内相当多的人却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仍把他们看成是理论权威。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识到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同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克服各种不良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并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随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学习，整风运动在高级干部中率先开展。

全党整风是以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开始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随后，整风运动在各个根据地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真正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在全党完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整风运动开创了通过整风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教育，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